

历史视角下的中国致公党的 “四大”“五大”和“六大”

陈昌福

(致公党上海市委, 上海 200041)

摘要: 建国初期, 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引导和帮助下召开的“四大”“五大”和“六大”, 承载了致公党自以海外为活动基地内迁大陆, 并适应国内政治生态环境的全过程。与其他民主党派相比, 有其个性, 而这一个性又寓于同时期我国民主党派活动的共性, 呈现为: 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中央会议确定政治纲领和任务, 以及组织发展方针的重点, 认知党派基本属性, 明确活动主要范围, 并投身于历次政治运动的锤炼等。

关键词: 共同纲领; 主席团制; 政党的新民主主义性质

DOI: 10.3969/J.ISSN.1672-0911.2020.02.049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911(2020)02-0049-08

1949年9月, 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 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并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赋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正式形成。从此, 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中国致公党多年来为之奋斗的“公天下”的理想目标成为现实, 致公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1949年底, 中国致公党的总部从香港迁至广州, 从此走上了崭新的道路。

—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 由此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党, 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建设新中国的重任。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和基本国情, 新中国在国内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联合政府; 在国外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盟, 即外交政策的“一边倒”。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这三年的时间里, 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 为全面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不到9个月,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 于10月8日作出了“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决策。这一决策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响应。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6个军跨过鸭绿江, 抵达朝鲜前线, 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 毅然承担起保卫世界和平的历史重任。同时根据中央的部署, 从1950年冬至1953年春, 在广大农村, 分期分批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真正实现了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奋斗目标, 从而最广泛最深入地调动了农民参与革命与建设的积极性, 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

收稿日期: 2019-11-04

作者简介: 陈昌福 (1935-), 男,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 致公党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教授。

万方数据

自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原来一批在国民党逃亡台湾前夕有计划地潜伏和残留大陆的反革命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激起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慨,要求人民政府采取坚决措施镇压。从1950年12月开始到1952年底,基本上清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有力地支援和配合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使社会秩序得到前所未有的安定,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

从1951年12月开始,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国家公务人员中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根据“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精神,各地层层召开会议,干部带头检查。到1952年上半年,“三反”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共产党内和国家机关内的隐患。同时,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的轨道,对资产阶级进行改造创造了必要前提。

和上述各项运动相结合,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又同时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是在一般知识分子中进行,而且也在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民主党派中进行,民主党派思想改造主要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准绳,要求各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行为符合《共同纲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帮助民主党派团结进步和支持对民主党派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方针,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祖国建设事业中的真诚合作;各民主党派也确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纲领而服务的政治路线。1950年3月,新中国成立刚半年,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李维汉同志于3月21日在会上作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均对一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主要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程

度的联系和代表性,但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它们都参加了民主联合政府,都宣告以共同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并接受中共领导,这就说明了它们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1]针对党内存在严重的取消民主党派的“左”倾思想,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把各个阶级的意见反映给我们,在政治上他们也能够更好地同我们合作和配合,有些工作他们去做有时比我们更有效,在国际上也有影响。”^[2]

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并指示:“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没有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其实,他们起的作用很大。从整体看,从长远看,必须要民主党派。”^[3]经过学习讨论,会议确认,各民主党派“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认为民主党派可有可无,或者忽视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都是错误的”^[4]。

二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从1950年4月至1952年11月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致公党连续在广州召开了“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四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国致公党(四届)中央干部会议”三次重要会议。会议的密集,客观上说明致公党自港迁穗后,面临许多紧迫问题,亟需解决。与其他民主党派不同,致公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以海外为活动基地,对于国内长期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整体组织状态和政治环境有一个融合的过程。这是涉及致公党自身建设与适应国内政治生态的根本性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致公党就无法应对建国初期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运动,生存并发挥作用。有幸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致公党作出了一个政党能动的反应,很快适应国内的政治生态,坚定不移地循着致公党“三大”选定的道路砥砺前行,最终实现了向新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型。

对于建国后第一次在大陆召开的致公党“四大”，1949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作了“即将召开”的报道，1950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对“四大”召开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同时中共华南分局对这次会议给予充分关注，统战部左洪涛副部长参加了会议，帮助致公党回顾过去走过的道路，确定了致公党今后的方向和任务，并引领致公党去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

致公党“四大”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政治纲领、组织路线和领导核心这三个问题。

“四大”总结了自“三大”以来的工作，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了章程，大会通过“宣言”宣布：“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本党三年前所定的政纲，已随它的光荣任务的完成而不适于当前的形势，大会一致决议予以取消，并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共同纲领为本党的政治行动纲领。”大会号召全体党员，应为共同纲领的实施积极斗争。《共同纲领》集中体现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建国初期的共同奋斗纲领和共同准则。《共同纲领》的基本任务是要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历史任务，恢复和发展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为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条件。1950年至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就是要完成上述任务。

“四大”的党章虽然没有对致公党的阶级属性作出明确的表述，但它清晰地指出致公党具有自己特殊关系的对象——“致公党是代表华侨的政党”，“成员绝大部分是散处在海外各地的华侨”。而从政纲来看，致公党既然宣布《共同纲领》为自己政党的政纲，这就已经说明致公党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四大”会议决定：“今后为配合新中国的建设，应加强海外的组织，但在国内则停止组织的发展。”会议讨论了致公党今后的任务，指出：本党“应特别关切华侨、帮助华侨、团结和教育华侨，并号召华侨踊跃投资国内的生产建设，发挥华侨革命传统的爱国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会在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上选择了“多数人领导”的“主席团制”。这一选择的背后其实是领导权之争，客观上也是党的领导核心尚未形成的反映。据伍觉天副主席回忆：

“记得四届代表大会一开始，有人即掀起一股‘狂潮’，要推倒‘当不了大官’，荫不了‘致公党人才’的陈其尤等人。也有人说，陈其尤水平不高，声望不高，作一个民主党派领导人不够格。两批人都想拥戴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人出任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5]为了击退致公党内“倒陈”狂潮，达成党内、尤其领导核心层的团结，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左洪涛副部长代表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我们的态度是明朗的，陈其尤先生代表致公党签字拥护《共同纲领》，没有理由不拥护陈其尤为致公党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协调下，暂时以“主席团”制形式组建致公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最大限度内达成党内的团结。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几经酝酿，选举出陈其尤、官文森、陈演生、雷荣珂以及保留美国三藩市一个名额的五人主席团，陈其尤为召集人，郑天保为秘书长，陈炳翰为副秘书长，罗伟夫为组织部长，李星川为财务部副部长，‘倒陈派’在常委会中占了绝对多数”。而“代表致公党出席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黄鼎臣、严希纯被排除出常委会”。

对于这次“倒陈”事件，在18年后的1988年11月8日中国致公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工作报告中，认为这是党内少数仍然抱着资产阶级民主看法的同志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50年）上有计划地夺取本党的领导权以实现其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阴谋。他们还公开说接近统战部的人是出卖致公党，等于致公党的“汉奸”这种极其反动的言论，以打击靠近共产党的同志。

对于刚从香港迁至广州的致公党来说，正好处在刚刚实现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政党转型，政党思想基础还不够牢固。上述这些问题的暴露，有它深刻的内在原因。所以在全国代表大会后，致公党进行了整理党务、健全组织和重新登记党员的工作，加强自身建设。

为了确保“四大”规定的各项任务得到贯彻落实，中国致公党于1951年4月2日至11日在广州召开四届二中全会（扩大）。出席会议的共有中委25人和特邀出席的干部11人。会议针对“四大”全会暴露出来的党内领导层的团结和致公党应在国内发展组织问题展开了讨论。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饶彰风部长参加了会议，与代表们就形势、任

务、统一战线、内部团结、党堂关系、组织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统一认识并要求代表们“加紧学习，提高政治水平”，做好党务工作。

四届二中全会再次讨论了组织工作，决定今后的组织工作在国外以华侨为对象，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同时加强对海外华侨的宣教工作，在国内，由于致公党中央党部由港迁穗不久，还不具备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的社会基础，但为了充实党组织的干部队伍，应适当吸收归侨、侨眷和侨务工作中的积极分子入党。

会议强调要贯彻《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精神，动员广大党员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争取反侵略斗争的胜利。致公党的领导人还先后参加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亲切慰问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会议重申：“我党目前中心的政治任务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在这一任务下，必须结合完成土地改革及镇压反革命的紧急任务。”

然而，这次会议开得也不平静。1980年11月18日伍觉天在干部培训班上介绍致公党史的讲话中说：“1951年第四届二中全会时，对如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发生了一场极其激烈的争论。从这一次争论中，使很多同志认识到，从旧民主主义思想转到新民主主义思想，真正接受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改造，是一个多么艰苦的过程。致公党第四届（次）代表大会的章程虽然规定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为致公党的政纲。但文字上的决议不等于不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得到贯彻执行！”

这次会议对司徒美堂“以朋友身份从旁协助”致公党开展工作的决定表示尊重。

与四届二中全会只相隔八个月，致公党于1952年1月2日至9日又召开了一次中央干部会议。会议除了总结致公党参加三大运动和党务工作的成就与缺点外，重点是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严肃地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同时针对“开大门、招兵马”把致公党搞成大党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错误思想，进行严肃批判；再次确认在以纯洁内部、巩固组织为主这一原则下，适当发展归侨中的进步骨干分子，充实中层，健全领导的组

织方针。通过这次干部会议，全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以高度责任感参加三大运动，即思想改造与“三反”“五反”运动。

三

在建国的最初三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民主政权，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迎来了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953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进一步完整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的主体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的实质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就总路线提出的三大改造的具体途径来说是有中国的特点的。但就“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来说，明显的是受到苏联的影响。当时，强调学习总路线要结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从而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一个观念，“以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主要看所有制”，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一选择，正如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探寻。“历史的发展表明”，正如龚育之在《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中说：“无论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当做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还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看做唯一模式，都不利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探索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和道路。”^[6]然而，无可否认，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提前发生了转向。原来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调整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

在这一形势下，中国致公党于1952年11月8日至17日在广州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与四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干部会议相隔还不到10个月。“五大”提出致公党今后的中心工作：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而奋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号召海外华侨投身到祖

国的生产建设，迎接即将到来的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积极投身思想改造运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会议回顾与总结两年多来，致公党“在各个政治运动的锻炼中，在不断的学习与工作中，使党员的政治水平提高了”（伍觉天《党务报告》）。这短短的一句话，却浓缩了致公党不断趋于成熟的极其宝贵的经验：不断加强理论学习，通过政治实践的历练，经受运动的磨练和考验。致公党整体的政治认识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从而“使本党跨进了新的发展阶段”（陈其尤“五大”闭幕词）；同时通过整顿党的组织，“党内部比较纯洁了，党的组织也较以前巩固了”；“思想渐趋一致，党内邪气下降，正气上升，团结增强”，清算了“本党代表洪门的思想”和“把本党与洪门毫无区别地混为一谈”的错误思想，进而明确“本党历史上与洪门有很深的渊源，有特别的关系，这是事实，但不是代表他们”。“在维护海外华侨正当权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会议决定加强和海外华侨的联系，为归侨和侨胞服务，号召一切侨胞团结起来，为祖国建设和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会议对“党章”作出重要修改，在党章形态上，“五大”党章确定了“于党章之首，加上总则”；在内容表述上，与“四大”党章相比较，更加明确和规范：一是在党的政纲方面，一改“四大”“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样软绵的语气，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是中国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纲领，也就是本党的政治纲领”；二是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与“四大”章程的“回避”和“淡化”不同，“五大”章程以鲜明坚定的语言表述“中国致公党是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中国各民主党派同一目标，同一步骤，以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为其历史任务”。三是根据“两年多来的事实证明”，取消“四大”设置的“主席团的不合理组织”，改设“中央委员会正副主席及中央委员”。通过党的章程的修改，“使全党同志更有统一的鲜明的认识”。

“五大”对中国致公党的未来充满信心：“今日已有可能而且必要建设为一个健全的新民主主义的政党，以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而完成其历史任

务”，显示出致公党的新民主主义政党意识正在趋向成熟。

“五大”会议后，为适应工作需要，致公党中央党部于1953年7月底从广州迁到首都北京。

这里，有必要提请注意的是：一个政党存在的价值是由它的历史活动证明了的。一个政党的传承和优势是由它的历史实践积淀起来的。如果说以致公党“四大”为标志，致公党能动地适应国内的政治生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政党。那么，致公党“五大”以来的实践和作为，则是充分显示了致公党作为华侨政党的传承和存在的价值，以及它在新中国侨务工作中的政党功能。同时从“五大”的文件中不难发现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致公党十分重视对其赖以生存和活动的政党资源的涵养和对它特定的社会群体和基础的沟通、了解和研究，并努力服务于他们。“致公党是由洪门致公堂改组过来，以国外华侨特别是海外洪门人士为基础的政党”（黄鼎臣）。致公党的社会群体和基础涵盖了海外华侨、归侨、侨眷、侨务工作者以及海外洪门和华侨社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致公党一直在为其独特的人脉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在服务大局的前提下，不仅目标任务明确，政策界限清晰，而且在具体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上都有成功的实践。这是致公党的前辈留给后人的一笔财富和历史智慧，需要我们去挖掘和提炼，凸显致公党侨海内涵的时代特点，并运用它来推动今天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致公党的“五大”是它历史上的一个侨色最浓、侨意盎然的时期。

四

经过建国初期三年的努力，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土地制度变革在全国基本完成。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经历了一个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乱后，由新中国开始的第一次大规模经济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了新的国家领导人。会议正式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大的召开、宪法的制定和公布，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

发展。

从1953年到1956年底,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由于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空前的高潮,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经受了三大政治运动考验的致公党,面临着如何逐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而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合作,发挥作用。“为了及时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致公党在京常务委员于1956年2月28日举行临时会议,决议于1956年4月5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经1956年4月3日召开的中国致公党五届二中全会予以“追认通过”。

1956年4月5日至13日,中国致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其尤致开幕词,黄鼎臣作《党务报告》,严希纯作了《关于本党章程的说明》。根据致公党“四大”“五大”以来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民主党派在实际政治生活上已变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主党派,又在我国有了宪法之后,以前的共同纲领的基本内容已纳入宪法,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又根据宪法在章程的总纲中规定了所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个单位和个人都要遵守的七条准则。因而在大会讨论通过的党章总纲强调致公党的民主党派性质,明确致公党的历史任务,并以简洁规范的文字规定为“中国致公党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为本党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力贯彻宪法的实施,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为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党章对致公党性质的表述是在沿用“民主党派”基础上突出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功能。

大会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的决议》,号召党员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加强思想改造,全力支持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以各种方式加强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全力以赴协助政府贯彻华侨政策,团结教育所能联系的华侨、侨眷,及时了解、研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会议还着重研究组织建设的工

作,强调继续巩固组织,并在“巩固组织的基础上,适当地吸收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和对华侨工作有经验的热情的积极分子入党,扩大团结,充实骨干,并有重点地在福州、厦门、江门、汕头等侨区建立适当的机构”。致公党“原是代表华侨的政党,同志遍及南洋群岛和美洲”。为了避免引起有关国家的疑虑和外交纠纷,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对外政策的精神,致公党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组织路线并扩大了党员构成的社会基础,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决定。“六大”会议正式确认自1952年以来致公党停止在海外开展组织活动和发展组织的决定。从此,致公党的发展对象改变为国内的归侨、侨眷中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和一部分侨务工作者。这也是一个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外关系和政策相适应的决定。

如上所述,止于中国致公党“六大”召开的建国最初的七年,中国致公党在中共帮助下,通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会议,确定政治纲领和方针任务,明确党派活动的主要范围和组织发展方针的重点,从而很快适应国内的政治生态,经受了社会改革和过渡时期的考验,并在践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充分发挥政党能动性。虽然“六大”对致公党自身继续袭用“民主党派”的称谓,但它的实际行动进一步表明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

然而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一时间段里,致公党在国内政治格局中曲折前进,并与中共一道经受考验。

五

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中国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基础也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初步确立。这些变化直接关系到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地位,换言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

党派是否还有存在价值，是否还需要实行多党合作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被提了出来。对此，毛泽东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毛泽东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同年4月15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会议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作了阐述，并作为以大会决议形式确定为党的一项基本方针，从而为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实行合作共事奠定了理论基础。

根据中共“八大”的精神，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失，资产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而与他们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在这样情况下，作为由上述这些人士组成的民主党派显然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是我国民主党派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特殊性。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的迅速到来，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发展是一场新的考验。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20年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陷于长期的曲折发展之中，使我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局势蒙受了严重损失。

中共“八大”前后，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在国际上，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揭露和纠正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受其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引发了连锁反应。东欧一些国家政局发生动荡，相继发生华沙学生上街游行事件，匈牙利布达佩斯罢工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了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在国内，受东欧波、匈事件影响同时，也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存在过急、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的缺陷，以及经济建设出现急躁冒进等问题，在一些城市和农村中，出现了一些不安定因素。国际、国内新形势和新情况，提醒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注意和处理。

中国共产党在研究和分析苏联以及东欧和国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原因和教训中，意识到在我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后，执政党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以及党群关系等方面，存在着与这一转变不相适应的问题。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宣布：“我们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进行整风。很快，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957年5月，毛泽东发表《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标志着运动的主题开始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整风运动转向反击右派。1957年6月8日反右派斗争开始，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章《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指出，“就现状说，各民主党派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文章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性质的判断出现了反复。

“为了捍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长期奋斗所获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陈其尤、郑天保、黄鼎臣发表纪念致公党“三大”文章，有针对性地要求全党继承和弘扬致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加强学习马列主义，加强自我改造，不断跟着时代前进，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自己的作用。1957年7月12日致公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致公）党内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坚决地与资产阶级右派分

子进行斗争,站稳立场,与他们划清界限……加紧自我改造,解决我党成员的政治立场问题,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这是一次阶级斗争必须严肃认真负责,不获全胜决不收兵”。7月20日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又一致通过了“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决议”,要求全党“必须在现阶段全国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已取得初步胜利并正在深入的基础上,更深入地坚决进行反右派斗争”。

1957年9月13-19日,致公党中央举行六届二中全会(扩大),讨论如何把反右派斗争继续深入下去,并对党内的一般整风工作进行总结。

然而,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进行,反右派斗争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致公党的一些领导人和成员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民主党派的改造问题。会议的召开,标志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并确定了推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随后,各民主党派相继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宣布在民主党派中反右派斗争和一般整风运动结束并确定今后一个时期各自的工作任务。

1958年11月8日,中国致公党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对反右派斗争进行总结,20日会议又作出决议:“大会认为经过反右派斗争及整风运动,我们党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又无奈地宣布,“我们党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因此,我们党当前最迫切最严重的任务就是加紧进行成员和组织的根本改造”,“使我们的党迅速从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转变成为一个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1960年7月25日至9月5日,致公党举行六届四中全会(扩大)。与会代表根据服务与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和情况,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决心“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发挥更大的作用”。致公党各级组织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贡献出自

己的全部力量!

1960年冬,执政党和政府开始纠正工作中的“左”的错误。1962年,全国分四批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55万人中绝大多数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这涉及一大批国家的精英,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和统一战线的恢复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1962年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科学工作规划会议。周恩来、陈毅在讲话中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民主党派被迫停止活动。所以,从1966年到1977年没有任何文献可供选编。这是历史造成的空白。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严峻考验加深了致公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了解。在逆境中,中国致公党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共同承受严峻考验。

从1949年到1966年,正是中国致公党“四大”“五大”和“六大”召开的时间段。岁月荏苒,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记载这一时间段历史的文献资料,尽管穿越了数十年的时空,却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知前辈的艰辛和勇于自我改造的胸怀和气度,体察一个政党的历史进步和走过的路。一个政党只有清醒地认知自己走过的路,才能走好当下和未来的路。

[参考文献]

- [1]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2.
-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680-682.
- [3]江平.当代中国统一战线(上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62-63.
- [4]中共中央统战研究室.历次全国统战会议概况与文献[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15.
- [5]伍觉天.从事致公党工作46年[J].致公通讯,1982(01).
- [6]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466-467.

(责任编辑:张迦寓)